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在全国
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薄 一 波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一九八〇年四月

同志们：

文彬同志要我来跟同志们见见面，在党校工作会议上作个发言，讲讲经济问题。两个月以前，我在中宣部召集的中直机关、国家机关、北京市党员干部会上讲过一次。今天，在那次讲话的基础上，再就有关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对三十年建设的历史，讲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来，共同商讨。

第一、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剑英同志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讲话的第一部分，对三十年作了总的回顾。许多重要的问题，他都讲得很透彻了。这里，我主要从经济工作的角度、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三十年经济的发展，大体上来说，经历了四次转折和四个阶段；加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的转折，就是五次转折。三十年，五次转折，四个发展阶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一

次伟大的转变，是我国革命发展史上极为重大的里程碑。从经济发展来说，这是第一次转折。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内，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实际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取得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毛主席对这一段的财经工作有过很高的评价。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特别称赞陈云同志，说他很能干，在延安时还没有完全看出来。毛主席一边说，一边写了一个“能”字。经过三年恢复，很快地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起，以苏联援建的“一五六”项工程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我在这里着重说一句，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陈云同志、富春同志搞出来的。我还要补充说一句，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帮助了我们。“一五六”项就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帮助我们搞出来的。回忆经济建设历史的时候，要想到斯大林。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安排得比较好的，是经过综合平衡的。当时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理解上执行上都是比较正确的。那时，我们考虑到，如果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

业、国防建设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装备和原材料，就发展不起来，那样，我们就会犯“软骨病”。在实际执行中，我们部署了钢铁工业，同时部署了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制造业，特别注意了煤、电、油、运的平衡，部署了燃料动力工业，那时和重工业部平行的，还专门设置了燃料工业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注意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比较注意重轻农的协调发展，在基本建设中，比较注意“骨头”和“肉”的关系。当时能搞出这么一个好计划来，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人提出，那时我们搞计划的知识不多，也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怎么会搞出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计划来？这值得很好地思索一番。当时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注意了综合平衡。三年恢复了经济，随后又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五年计划，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快的，蒸蒸日上，社会风尚是好的，人民生活也是逐渐提高的，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吗？！当然，大家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说经济的发展比较正常，也不能说那时一切都搞得很好。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2）一九五六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了第二次转折。这里说明一下，我讲的“转折”，是按照历史走过的脚印来说的；我们通常讲“伟大的转折”，这里不是从那种意义上说的。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折，情形比较复杂。一九

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现在来看，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一九五六年初，毛主席着重提出我们要找出合乎我国具体情况的经济发展的道路，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有名的“多快好省”，就是这时开始提出来的。这一年的春天，先是刘少奇同志找工业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最早找的是轻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座谈、汇报。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意见，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也提出来了，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战时和平时关系问题也提出来了。这时候，我有一次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现在少奇同志在那里主持一些工业部门汇报。毛主席说，这很好，你也给我组织一下，我也听一听。从此，毛主席在两个多月内，亲自听了中央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我们搞建设的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四个部门汇报”。毛主席那时工作得很紧张，叫做“床上地下”，就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才上床休息。毛主席认为这些汇报很好。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边汇报、边议论，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反对了教条主义，反对了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中的那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明确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听了汇报以后不久，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直到现在，这个报告还是对我们工作起重大指导作用的文献。那时候，在我们的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亲自出马，最后毛主席总其大成。从“三

十四个部门汇报”到《论十大关系》也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既是毛主席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

一九五六年八、九月间，召开了“八大”，确定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希望党校的同志把“八大”的报告再研究一下，看看那上边的提法有什么问题？我认为，今天看来，那仍然是个正确的、很重要的文件。“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现在中央正准备给少奇同志恢复名誉，不久就将正式做出决定。三顶“帽子”根本不能成立，完全是强加的。少奇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八大”的报告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陈伯达、康生反对，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以后，把刘少奇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的这个观点打“垮”了，结果是我们党倒霉、受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周总理主持编制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好建议后来并未实行，不知不觉地搁置起来了。毛主席后来在《十年总结》里还讲到，一九五六年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一九五六年，就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后来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次转折，出发点是想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经济的发展也是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对这两年的工作，今天大家都认为是做得相当好的，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下半年，就出问题了。大约在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这个口号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具体工作的部署上，着重是赶英国历史上钢的最高生产水平二千二百万吨。实际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钢为纲”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当作自我批评。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亲自主持搞了个农村工作设想的“十七条”，以后发展成为“四十条”。那时我主管工业交通工作。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以粮为纲”，带动其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我没有很好思索，就马上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今天检查，这个口号不对头，至少是不妥当，我有责任。实践证明，以钢为纲，并没有带动一切，也带动不起来一切；相反，挤了轻工业、农业，也挤了煤、电、油、运和其他。一九五七年，我国钢的产量已经达到五百三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了三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这确实是个很大的成

绩。冶金工业部那时是王鹤寿同志担任部长，工作做得好。毛主席称赞他工作有成绩。到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那时我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管工业、交通兼管年度计划，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能不能再快一点儿？一九五八年的计划，钢的指标原来定为六百二十万吨，比上一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八十五万吨，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按这个速度前进，中间不要有什么大的波折，大体上到一九六六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国钢的产量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左右，就可以实现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的十五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了。这里应当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当时提出的有些口号，离开了第二次转折开始时提出的正确原则。总的来说，第二次转折，原本是寻求经济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愿望是好的；起初实际上也转得很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循序渐进，大有可为。但是不满足这一点，到一九五八年，再加劲，就转歪了，这就造成了以后一个期间我们工作上的很大被动。这算是第二次转折。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大跃进、三年困难，可以算作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前面说过了，这个阶段是在不那么正常的状态中开始的。南宁会议以后，“反右倾”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指标高，“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

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一九五八年三、四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拔白旗、插红旗”,“白旗”就是指那些主张指标比较稳当的。会后,又提出反对“稳妥派”。我顺便说一句,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这些决议,我当时没有任何怀疑,是坚决执行了的。一九五八年四月,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不是六百二十万吨,要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五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反右。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组织人民公社,当年搞七千亿斤粮食,还正式提出“以钢为纲”,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在“一〇七〇”问题上,我负有一份责任。对“一〇七〇”,我本来是有怀疑的,但大家都说行,我也大概算了一下,并没有细算,觉得有这么多高炉,这么多平炉,那么多矿山,那时又强调算活账,算大账,反对见物不见人,这么一算,还可以达到。于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我把鞍钢、武钢、太钢这些大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和这些大钢厂所在地的工业书记都叫上,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大家去了一谈,都说行。毛主席也很高兴。我向毛主席建议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时候,毛主席第一句话就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接受了薄一波同志的建议,把“一〇七〇”公布了。应当说,在北戴河会议上,

毛主席对“一〇七〇”是有过怀疑的，并不那么相信，他引用了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离年底不到四个月，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去完成。但是，还是下了决心，要保证实现。于是，六千万人上山，全国各地地方都动员起来大办钢铁。包括中央各机关，中央党校也是这样干的。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工作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泛滥出来了。一句话，违反了客观规律。比如“吃饭不要钱”，这是柯庆施同志的口号。饭有的是，不吃掉怎么行？有一个人执行他这个东西，看到过路人，走了多远还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非要叫他吃不行。还有，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还有，叫做“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张春桥写的文章。如此等等。从工业、交通战线来说，原来提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不久就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少一点时间，过几天又改为十二年，再过几天又改为十年。后来索性说，只要大家努力，一两年就能赶上。为什么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钢的生产指标总想搞到两千万吨？就是想很快赶上英国。

以上叙述了一下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后的情况，那时候一下子就把风吹上去了，吹到了极端，“左”了，“左”得很。这是第二阶段发生的一些问题。

但是，应当公道地讲，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纠正高指标、

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纠正的时候也是非常紧迫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集合了一些省市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在这次会上，着重讲了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法则，提出了读两本书的建议，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十一月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也是解决这类问题。毛主席说，“一〇七〇”是个冒险的计划，六千万人上山，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主张把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压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讲了要用四个月到半年整顿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二月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四月开上海会议，特别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和波浪式前进的问题，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还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上海会议后，中央指定陈云同志调整钢产量指标。陈云同志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三百五十万吨。执行的结果证明，这是切合实际的。总之，这个期间开的会，都是类似性质的工作会议，直到六月上庐山，都是纠正冒进的错误，毛主席亲自主持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毛主席对一些主持财经工作的同志讲，现在不能再支持你们了；还说，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大家的冒进。提出要“压缩空气”，劳逸结合，冲天干劲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我记得在武昌会议

上，还讲到真老虎、纸老虎问题，说重要的是，我们当前遇到的是真老虎、铁老虎，啃不下来，硬是啃不下来。毛主席很注意纠“左”的方法，反复讲“气可鼓而不可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强调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那是泼冷水、泄气，“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有八个月之久，空气有一些压缩，但是劲头特别大的人们并不服气，思想上是否有所触动，很难说。

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庐山会议开始了。前半个月，开的是“神仙会”，继续“压缩空气”。毛主席检查了一年半来，许多政策执行的结果，成了“一条腿”。还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特别提到，是否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反过来，提农、轻、重。还讲：过去陈云同志提过首先安排好生产，安排好市场，其次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前半个月，会议开得很好。就在这个时刻，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同志提出了有名的《意见书》。从内容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没有错误，里面讲的许多问题，跟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半段议论的内容差不多，他收集了一些材料，作了分析，更加明确地把这一期间讲的东西肯定了下来，加了一句政治评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从组织上讲，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

主席写信提意见，也是正常的。可是，极力提倡吃饭不要钱和主张“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人们站出来反对，说这不是“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场风波。

庐山会议的后半段，从工作会议转到开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在八月二日讲了话，着重讲了路线究竟对不对的问题。于是，会议的方向转了，不谈经济问题，转到专门谈政治问题以至历史问题。各方面一翻腾，大家的情绪就来了。所谓“大家情绪”这个提法不科学，反正是情绪吧。结果，八个月反“左”的成果，不但没有巩固下来，反而弃之于一旦了。从此还是要反右。结果弄成一九五八年搞的那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似乎又都是完全正确的了。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紧张了大半年，在座的同志都是经过的。我从庐山一回来就作检讨。因为我在上庐山之前，作过几次报告，在报告中也说过大跃进造成了比例失调；还由我口授，请薛暮桥同志给我整理了一个材料。到了庐山，由于自己风格不高，也就不敢拿出来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我的时候，说你薄一波就是个漏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在庐山会议上准备了个材料，不敢拿出来。我说是有这么一回事。说我右倾，就算右倾吧。

庐山会议后不久，来了个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这件事，激起了大家的义愤，说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你撤走专家我们也能干，比你的专家在的时候还要干得好。钢，什么一千八百万吨，非搞两千万吨不可。那时，有个响亮的

口号，叫作炼“争气钢”，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总之，什么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唯物论，辩证法，等等，都抛掉了。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逐渐压缩了的空气，庐山会议后的大半年里又加倍地膨胀了起来，造成了经济严重失调。

（3）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了第三次转折。到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就慢慢发觉搞错了，走不动了。毛主席在《十年总结》里，强调提出要留有余地、藏一手，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来自实事求是。后来又强调要彻底纠正“五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工作做细，要搞具体的工作条例。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农业六十条”的起草工作。“工业七十条”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定稿的，毛主席多次称赞过这个“七十条”。还有手工业、商业、科学文教事业等等，统统搞条例。到一九六一年，正式形成了“八字”方针。我想讲一讲“八字”方针是怎么搞出来的。大约是在一九六〇年第四季度，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李富春同志在搞一九六一年计划的时候，提出“调整、巩固、提高”这六个字，就是说计划应该按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安排。向周总理汇报以后，总理提出在“调整、巩固”后边，加了“充实”两个字，于是形成了“八字”方针。这第三次转折可以说是以“八字”方针为标志。周总理、陈云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时期做了许多艰巨的细致的工作，有些人当时并不觉悟，

还是反对，说三道四，周总理给顶住了，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也出来顶住了。应该说明：这次转折，是被迫进行的，不干也不行，因为三年大跃进造成了比例严重失调；这次转折，是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因为那时不调整就走不下去了，如果再蛮干下去，国民经济就要垮台。

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这时，陈云同志再次出来主持财经计划工作。陈云同志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工业要退够，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重新安排生产、基建，计划不留“缺口”，等等。小平同志当时是总书记，支持这些意见。一九六二年一月，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毛主席讲了话。

当时，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关、停、并、转。那时厉害呀，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每年三百亿左右，一下子压缩到五、六十亿。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去由于搞高指标、基建战线过长，最高时达到一百二十多亿，用了很多办法压缩到八十亿，减了四十亿。陈云同志提出搞一些高价商品，什么炒肉片呀等等，来回笼货币。那时候，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有两千四百五十万人，到一九六〇年就猛增到五千万人，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动员两千万人下乡。那时党的威信很高，中央的决心也很大，一声号令下去，两千万人不

是下乡了嘛！毛主席说过：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利益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当然，也应该说，大跃进那几年的工作，是有负于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期望的。尽管如此，群众还是比较能够谅解我们是好心做了错事。现在不同了。现在厂、矿、企业也有多余的人员，这当然不敢动；问题是还有一千几百万人要求在城市里安置，不少人闹着要回城，现在成了我们的一个最大难题，六十年代初那次调整，“退”下来是为了求得各方面的平衡，以便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前进。不仅仅是减人、关厂、压投资，不是简单地“退”下来。应该说到，那时候，还初步总结了经验，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记得，一九六二年冬天，在广州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后，富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说总理要代中央起草一个“工业决定”，那次搞得工业决定草稿，在强调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还强调了要摆正安排好人民群众吃穿用的位置，等等。这个决定草稿今天看来还是有意义的。那时，还强调要在整顿企业、管好工厂上下功夫，打基础，普遍试行了“工业七十条”，比较快地扭转了企业经营管理混乱的状况；同时，还提出了按经济办法组织生产和管理经济的原则，搞专业化和协作，搞托拉斯试点，全国试办了十四个大托拉斯，都取得效果和经验。总之，当时的调整，内容相当丰富，工作十分艰巨，获得很大成功。从一九六一年确定“八字”方针，

经过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经济就基本恢复了。一九六四年开始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六五年经济形势更好，生产欣欣向荣，市场活跃，人民高兴。我们的国家又恢复了元气，而且向前发展了。

（4）就是在这个时候，当国家积蓄了一些力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突然开始了。经济建设进入了第四次转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以及它的发展和结束，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作了全面论述。仅从经济上来看，这十年是一次大折腾。这次转折，同前三次转折性质是不同的。这次转折，指导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严重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引到了绝路，几乎走到了绝境。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直到粉碎“四人帮”，这是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当然这十年中间情况也是不同的。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这一段，周总理主持工作，用较多精力抓经济的时候，情况有一定的好转。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候，经济也有了起色。不过，这两段时间都不长。十年中间情况虽有所不同，但总起来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十年一贯制”，最后把我们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崩溃的边缘，这是华国锋同志讲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盘否定了前一个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说是什么“刮下马风”，是“右倾机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大批“工业七十条”，大批托拉斯，反对专业化和协作，大批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